

## 主持人语

阿富汗与中国比邻而居，被称为亚洲心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战略价值极为重要。阿富汗战争迄今已持续 40 年，这使它成为若干跨国恐怖主义力量的聚居地。世界大国在阿富汗长期竞夺，使其国内政治和社会关系十分复杂。2020 年出现了转折点：2 月 29 日塔利班与美国达成和平协定，9 月 12 日阿富汗人内部和解进程正式启动。在这个背景下，此次工作坊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一起回顾阿富汗政治和解的过去，分析当前的主要问题，展望和平前景。

关于阿富汗当前的局势，与会人员认为，美国态度改变是美国-塔利班协定的关键驱动力。其态度改变的缘由包括：调整国家安全战略、长期战争疲惫、驻军成本过高，等等。美国调整对阿战略是出于它自身的利益需要，不是为了阿富汗和平。当前阿富汗人内部的和解进程已经启动，但还没有正式进入谈判，还在讨论谈判程序。塔利班与喀布尔政府分歧严重，其争执关键有两点：其一，塔利班主张建立以哈乃斐教法学派为依据的教法统治，阿富汗政府以“包容性和平”为名，提出反对。其二，塔利班主张以《美国-塔利班和平协定》作为阿人内部和解的基础和依据，但喀布尔政府不同意。

与会专家认为，阿富汗政府在当前政治和解中的地位很尴尬。政府本身的主要问题是派系斗争激烈，腐败严重。阿富汗国家未来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有效政府、强大军队和警察力量、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阿富汗的政治

文化决定了它在国际关系中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会设法保持中立/独立，左右逢源。阿富汗问题从来不是它自己的问题。它的绝大部分问题都由外国引发，其解决也需要外国帮助。

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向，与会人员认为，首先，如果特朗普当选，则美国撤军将成定局。美国不会离开阿富汗。但它对阿富汗未来政治制度安排的具体细节没有兴趣，它只希望阿未来政府能配合美国的战略。阿人内部和解困难重重，出路在于：找到各方接受的权力分配方案，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支援和帮助。其次，和谈比战争好，但和谈还不是真正的和平。当前的和谈可能无果而终。即便达成和约也不等于能够实现和平。2019 年以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和基地组织明显重组，力量壮大。第三，应该进一步促进中国与阿富汗的友好关系，加强人文交流和经济往来。与会专家提出，中国媒体要帮助阿富汗在国际社会塑造积极形象，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美国和地区大国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利益。须注意美国的消极作用。

钱雪梅

2020 年 10 月 13 日

## “博雅德信工作坊”第 38 工作间

### 阿富汗和平之路：历史与未来

2020 年 10 月 12 日

本期工作坊的上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钱雪梅主持。中国前驻阿富汗大使馆代办张敏首先做了主题为《阿富汗实现和平的前景》的发言。内容包括以下 13 点：

第一，阿富汗从建国以来，国家的政治结构就比较松散。历史上阿富汗的西部、东南部和北部分别属于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和中亚的各个王朝，各地区分别受到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影响。1747 年出生于普什图部落的青年军官艾哈迈德摆脱了波斯帝国的统治，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一个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的部落联合体，民众的统一国家意识比较薄弱，民族认同和部落观念却很强。在过去 200 年的共同生活当中，各个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互融合。但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战乱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有所疏离。

第二，热爱独立，抵抗外来侵略者是阿富汗人的光荣传统。建国后 100 多年间，这块土地曾多次遭遇外来入侵，阿富汗人民在于他们的斗争中显现出热爱自由、独立、不畏强敌，用生命保卫自己家园、英勇善战的品格。

第三，19 世纪末埃米尔拉赫曼确定了今天的阿富汗的版图，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他对桀骜不驯的普什图人和非普

什图族的起义进行了强力镇压和血腥屠杀，终于实现了这个国家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同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

第四，1973 至 2001 年间，阿富汗先后经历了 4 个政权的武力更迭。在此期间，苏联为扩大势力范围，对阿富汗实行了军事占领。苏联解体后，阿富汗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第五，1996 年塔利班打败了圣战者（穆贾希丁），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他们进行严厉的宗教统治，实行原教旨主义，这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塔利班的做法使得其他各民族在内部互相之间建立联盟，造成了普什图人被孤立的局面。

第六，2001 年，美国及其盟友出兵推翻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在该制度下，阿富汗政府部门则根据民族和政治派别按比例配置，北方联盟的塔吉克人掌握了国防、外交和内务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塔利班和一些温和派被排除在外。重新组织后的塔利班将新政府视为美国的傀儡，继续称自己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半数以上领土，并将势力渗透入喀布尔，对美军展开恐怖袭击，准备进行下一步行动。

第七，美国是实现阿富汗国内和平的先决条件。美国陷在阿富汗 19 年耗资大约 7500 亿，士兵伤亡 2000 多人，造成了超过 10 万阿富汗平民伤亡，最终却一无所获。目前在美国全球兵力收缩的大背景下，为了加强印太战略部署，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几乎可以肯定。美国起初把塔利班定位为恐

怖组织，现在又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说明了美军急于从阿富汗脱身的状态。塔利班也愿意从自己的国土上把外国军队赶出阿富汗，但同时他们也坚持自己的条件，争取使美方做出最大让步。

第八，美国撤军后，理论上阿富汗将开始和平进程。长期战乱破坏了阿富汗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和结构，深化和固化了原有社会矛盾和困难。美国撤军后，要避免新的大规模冲突，为此需要各方签署协议。

第九，未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和一个有效的政府。和平后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难题，在阿富汗尤为突出。过去的100年间，除了查希尔国王，阿富汗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没有得到善终。自1992年圣战者掌权后，开始了以民族的派别来分配政府各部门权力的模式。在分配过程中塔利班的胃口很大，提出要掌握政府全部重要部门的要求。而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等民族他们也希望掌权参政，所以他们也不能允许普什图人独揽大权。

第十，阿富汗当前军队和警察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内和平稳定，震慑和削弱成建制的地方军阀和部落武装，但由于他们的生活困难，军心不稳。未来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国家军队，就应当提高军队待遇，当然这也需要资金，需要政府充分做好预算。

第十一，要处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作战人员等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主要力量。

第十二，阿富汗的问题都是由外部国家引发的。阿富汗争夺权力的各派背后都有至少一个国家支持。外部国家不能

被排除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之外，应通过召开不同形式的国际会议推动问题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警惕美国的消极作用。

第十三，中国与阿富汗互为邻国，阿富汗的和平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应积极推进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普什图语部主任席猛**，他的发言主题是《阿富汗人内部对话和谈判对阿富汗持久和平的影响》。他首先指出了“对话”和“谈判”的用词区别：阿人内部谈判是指包括阿富汗政府、塔利班以及阿富汗主要政治派别的阿人协商机制，而“对话”一般指 2019 年 2 月和 7 月在莫斯科和多哈举行的塔利班和阿富汗部分前政要举行的对话。

随后，席猛分别介绍了莫斯科对话和多哈对话的情况。他指出，尽管莫斯科对话因没有邀请阿富汗政府参加而遭到了喀布尔的反对，但该对话依然具有积极意义，即塔利班通过该对话释放了愿意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明确信号，也是塔利班为未来美国撤军后实现阿富汗人内部和解的积极努力。莫斯科对话的主要成果有：

1. 肯定各方通过对话实现和解的原则，商定在多哈举行下一次对话；
2. 塔利班和美国均对和解进程表示坚定的支持；
3. 重申外国军队撤离，反对恐怖主义和内政干涉，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的立场。
4. 强调阿富汗未来的政治重建应基于伊斯兰教以及广泛包容的原则。

阿富汗政府对多哈对话的成果做出了积极评价，为未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直接对话奏响了序曲。除进一步明确了莫斯科对话的成果外，各方在多哈对话中就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达成了共识：

1. 双方承诺不再针对对方使用激烈语言；
2. 避免对民用工业设施和机构人员的袭击；
3. 给予宗教少数派安全保障；
4. 对未来阿富汗政治架构的伊斯兰底色进行全面确认。

当前（2020年9月）正在进行的是多哈谈判，截至目前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席猛进一步指出，阿富汗和平进程长期不顺的原因既有美国的战略性失败，又有阿富汗政府的国家治理失误，还有塔利班的极端主义。美国不负责任的“来去自由”为阿富汗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而阿富汗政府构成复杂，执行力和权威性不足。此外，塔利班没有做好分享权力以及放弃原教旨主义旗帜的准备。在席猛看来，塔利班实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合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继续高举伊斯兰大旗，在阿富汗建立它所理解的“纯粹伊斯兰体制”。

在发言的最后，席猛认为阿富汗未来能否实现持久和平，关键在于平衡分配战后利益、清除国家治理中的腐败问题以及协调外来的援助步伐。

第三位发言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他发言的主题是《阿富汗人内部对话启动的背景及各方立场》。

王世达首先指出，2月29日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和9月12日阿富汗人内部谈判的启动是2020年阿富汗和平进程取得的两大进展。

随后，王世达介绍了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启动的背景和最大驱动力。他认为，2020年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启动的最大背景是各方在经历十几年战争后的疲惫心理以及对凭借军事手段难以在战场上彻底击垮对方的认识，而最大驱动力是美国的態度。他指出，阿富汗战争贯穿了美国的三届政府。小布什政府没有对阿富汗和平进程提出任何政策，其结局是塔利班重返阿富汗，导致安全形势再度陷入动荡。与小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好塔利班”和“坏塔利班”的区别，以政治手段辅佐军事行动，但依然没有实现其目的。特朗普政府尽管出台了所谓的“阿富汗及南亚新战略”，但在基本内容上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且同样没有实现预期效果。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最大特点在于战略调整的敏感度强，即2017年8月出台所谓的“新战略”，而2018年底就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促使美国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态度转变的原因有：1. 特朗普认为在阿富汗战场上投入-产出比过低，开始寻找战争之外的解决途径；2. 兑现2016年的竞选承诺有助于特朗普赢得2020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3.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大幅调整，认为恐怖主义已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应对中国崛起等大国博弈。因此，2020年阿富汗和平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和根源是特朗普政府通过政治手段从阿富汗战争脱身的强烈诉求。

关于各方谈判立场的异同，王世达认为，当前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最大着眼点在于尽快使阿富汗人达成内部政治协议，实现美国的体面撤军，其对阿富汗未来的政治安排已没有太大兴趣。他认为，塔利班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结束所谓的“外国占领”，另一方面在于建立以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为基础的伊斯兰体系，为此会同时采用和平谈判和武力施压两种手段。与之相比，阿富汗政府希望在美国撤军前通过谈判促使塔利班宣布停火，将塔利班纳入由阿富汗政府主导的政治安排，但由于它没有作为签字主体参与美国和塔利班的和平协议，且协议没有要求塔利班在美国撤军前先停火，因此随着美国撤军的加速，其地位越来越尴尬。

王世达最后指出，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长期过程，其核心问题在于未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权力分配。

本场讨论阶段，与会人员就多哈谈判的难点和谈判中美国的态度进行了讨论。

第四位发言的是中国阿拉伯经贸促进专业委员会主任**余明辉**，他发言的主题是《中阿关系的实质与实践》。在余明辉看来，中阿关系的实质是山水相连的亲戚关系，中国应尽快加入阿富汗的建设，在各领域调研的基础上参与实践。

随后，余明辉介绍了在阿富汗进行调研实践的客观环境。他指出，在政治上，阿富汗在前 20 年、乃至前 40 年经历了战争，如今更多的是政见争执以及对政府的批评，民意在政治生态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经济上，自 2001 年以来，阿富汗社会在生活习惯、消费市场等方面发生了巨

大变化，如新出台的《投资法》开始欢迎外国人在阿富汗投资建厂，允许外国人 100%占股，并给予投资商签证的便利，而阿富汗商务部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阿富汗进行市场调研，考察其工业和农业。为此，他强调认识新变化，在新形势下加强对阿经贸和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性。

余明辉介绍，阿富汗各阶层人民对中国人印象较好，中国人在阿富汗投资建厂实现了互惠互利，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同时加深了阿富汗人民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当前中国企业在阿富汗生存艰难的原因依然在于生活条件艰苦，这也是令当地百姓不满的最主要因素。阿富汗人对塔利班之所以抱有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改善生活，保障就业和个人利益，解决腐败问题，而塔利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认为他们除了限制自由以外，没有搞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在阿富汗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应当加强同阿富汗的合作与联系，通过解决就业问题改善经济，为当地人带来实惠。

第五位发言的是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他的发言主题是《阿富汗内部和谈进程的前景与制约因素》。他的发言围绕以下六个关键词展开：

1. 脱钩。朱永彪认为，除了所谓的“中美脱钩”外，阿富汗问题上也出现了脱钩：一方面是特朗普撤军与阿富汗和谈进程的脱钩，另一方面是阿富汗安全形势与和谈进程的脱钩，即安全形势并没有因和谈而有明显改善。

2. 强迫。朱永彪将阿富汗内部和谈形容为中国式的“相亲”和“逼婚”。他指出，目前对和谈最积极的是特朗普、

蓬佩奥和哈利勒扎德三人，而美国国防部、军方、情报界等对该问题均没有一致看法。此外，这一问题严重损害了阿富汗政府的权威，而塔利班几乎以零成本获得了巨大收益，这一切都源于特朗普的个人推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最初所追求的公认的、体面的、负责任的撤军已经自我修正为自圆其说式的体面撤军。

3. 时机。朱永彪认为，虚假的时机或时机不成熟的和谈与和平无助于阿富汗的长久稳定与发展。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方真正为阿富汗内部和谈和长久和平做好了准备，对美国撤离阿富汗后的国际援助没有做出明确安排。

4. 题型。撤军对特朗普和下一任美国总统而言是选择题、判断题，还是简答题、论述题？是常规题、加分题，还是“救命题”？2020年11月大选后至2021年1月间的变数较大。

5. 未来。朱永彪指出，阿富汗内部和谈进程的问题在于很多结构性矛盾（如塔利班和阿富汗各方对阿富汗政体、政权形式和结构的分歧等）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此外，各方在妇女地位、媒体地位等方面的分歧也没有解决。由于有关各方在谈判动力、资源、目标和节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阿富汗内部和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可能无果而终。应当重视塔利班，但不应夸大塔利班的实力。

6. 参照。朱永彪指出，可以将本次美国撤军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撤军以及苏联从阿富汗的撤军进行对比：有怎样的背景？基于怎样的目的？走了什么程序？……对比参照来看，美国撤军的前景较为清晰，有限的

长期驻军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特朗普为谋求连任而坚持撤军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第六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旭，他的发言主题是《当前阿富汗形势分析》。

王旭首先分析了阿富汗的整体形势，指出最主要的变化因素是美国调整了反恐政策和阿富汗政策。美国在阿富汗和谈问题上执行单边主义政策，在反恐上实行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反恐”，造成了阿富汗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1. 塔利班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进一步提升；
2. 国际恐怖势力持续活动，主要受以下两点因素影响：一是塔利班与宗教极端意识形态的割舍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塔利班在与美国签订的协议中承诺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但事实上缺乏切实的监督机制。随着美军的撤出，美国对塔利班的压力进一步削弱。二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实力有所恢复，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有意在战场上示强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随后，王旭对阿富汗当前的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 针对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领导层的打击效果明显，但伊斯兰国回流以及地区极端暴恐组织的伊斯兰国化也在加速。具体而言有以下四小点：一是长期盘踞楠格哈尔省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遭到重创，各级领导层有向朱兹詹省、库纳尔省和喀布尔市转移扩张和重组的趋势；二是打击方式由无人机打击转向城市抓捕；三是“斩首”效果非常明显，袭

击数量明显下降；四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活动地区大幅缩小，目前主要活跃在楠格哈尔省南部、库纳尔省和喀布尔市。

2. 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未来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新的外籍领导人能否弥合内部派系冲突，能否被本地成员接受，能否加速回流仍有待观察。王旭认为，派遣阿拉伯人担任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领导人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由非阿富汗人担任领导人有助于协调内部派系、特别是地方派系的冲突；第二，外籍领导人可以利用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网络来加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实力。由于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影响力和传统网络，因此他的优势远大于阿富汗本地或来自巴基斯坦来的领导人；第三，新任领导人原为基地组织成员，既可以利用伊斯兰国的网络，也可以利用原先的关系。其次，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成员结构转变为以非普什图族中产阶级男女知识青年为主。改变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这些青年对现状不满，认为伊斯兰国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可能更加正宗；第二，本地人看中了伊斯兰国的“平等”，即不分族群和宗教；此外，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阿富汗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城市化的进程导致了大量城市无产者的出现。再次，地区暴恐组织的伊斯兰国化呈现出两个趋同，即宗教意识形态和袭击手段的趋同；最后，伊斯兰国跨国流动的威胁在增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互动关系更趋紧密，双向代理人和双向跨境恐袭趋势明显上升。

在本场讨论中，与会人员关注了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的内部结构问题。王旭指出，在伊斯兰国内部，与宣誓支持不同，

宣誓效忠的组织必须接受伊斯兰国的直接领导。同时有学者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塔利班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一代领导人在对待新事物以及极端主义的态度上发生了分化，但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依然有较大影响力，其谋求的是政权而非金钱，很难进行谈判。

本期工作坊的下半场会议由中国前驻阿富汗大使馆代办张敏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新华社喀布尔分社前任首席记者赵乙深**，他的发言主题是《探讨媒体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赵乙深的发言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阿富汗媒体现状。赵乙深指出，阿富汗媒体整体上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 数量多，开放程度高。尽管阿富汗基础设施不完善，但对大多数网站没有任何管理和限制。阿富汗媒体涉及普什图语、达利语等多个语种。2. 质量低，影响范围小。阿富汗媒体的影响范围基本局限于阿富汗国内，甚至仅局限于某个省份或地区，无法对国际或南亚和中东地区形成影响力。3. 内容窄，欠积极正面。阿富汗媒体主要关注爆炸、杀戮、死亡等突发新闻以及民众的悲惨生活，但事实上阿富汗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赵乙深认为，在保证基本新闻事实的情况下，要多展现阿富汗积极正面方面，给国际社会和当地人民带去信心，改变人们对阿富汗的刻板印象。

其次，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赵乙深指出，在学理上，媒体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五点：1. 信息传播；2. 政治社会化；3. 影响舆论；4. 监督政府；5. 设置议题。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即媒体可以通过设置议题或主动发声将理念

和思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化的普及，以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促进社会群体对这一理念或思想的接受。

第三，媒体如何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赵乙深指出，媒体在以下四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1. 促进民族团结。当前阿富汗的社会政治经济依然以民族或部族为基础，阿富汗人民的国家意识还有待提高，阿富汗需要以一个团结统一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2. 塑造国家形象。当前阿富汗的新闻仍以突发新闻和暴恐新闻为主。在未来，媒体（无论是当地媒体还是国际媒体）应当考虑帮助阿富汗转变负面形象。3. 服务公共外交。媒体完全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做一些补位但不越位的事情。中国媒体在阿富汗的对外宣传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促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媒体在这方面大有可为。4. 提高国际关注。阿富汗虽然是一个“有话题”的国家，但在国际社会上缺乏影响力。媒体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为促进阿富汗国内的民族团结、促进中阿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中国媒体未来的努力方向：1. 持续提高质与量；2. 制作播出本土化；3. 充分利用新媒体；4. 顺应 5G 时代发展，利用先进技术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充分融合。

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传媒大学**讲师单丹，其主题是《“南亚双斯坦国家”民族与宗教矛盾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影响和对策思考》。

单丹首先指出，“双斯坦国家”指的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捆绑研究的原因在于两国均为中国西部邻国和“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的重要国家，两国人文相似，地理相连，

“三股势力”对两国建设均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两国均为伊斯兰共和政体，都是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整体来说，两国内部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威胁主要是民族矛盾严重、宗教极端势力猖獗和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不稳。

随后，单丹介绍了两国在“一带一路”规划布局中的地位。她强调，中巴经济走廊的“龙头”瓜达尔深水港的建设能够为阿富汗和中亚五国提供出海口，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 2014-2015 财年，中国已成为阿富汗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一批实力强、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在阿富汗投资兴业，为当地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对阿投资主要涉及矿产、通讯和公路建设。

单丹接着分析了民族矛盾和分离主义对两国的安全威胁。两国的民族问题一方面是跨界民族和民族分离问题，另一方面是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权力之争。巴基斯坦实行民族联邦制，独立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阿富汗虽然实行单一制，但同为“民族拼盘”国家，各民族有自己的聚居区，军阀分省割据，第一大民族普什图人和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始终在争夺国家主导权。此外，两国的农村地区大部分是封闭的部落社会，呈现出“民族——大部族/集团——小部族/家族”的结构。部族内部事务由各自首领管理，长老是地方基层政权的领导人，负责解决冲突。因此，两国农村居民大部分生活在自己所属的部落地区，部落长老的影响力强于中央政府，部族成员对部族的认同和服从高过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和服从。阿富汗虽然建立了民选政体，但国家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部落仍为社会的基

石，其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悬浮于部落之上。因此，阿富汗行政机关的政策难以落实到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各部落难以感受到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为其带来的福祉，甚至会误判为是外部力量在掠夺其内部的生存地域。

单丹认为，宗教极端主义对两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威胁主要表现在塔利班组织及其泛地区化。

最后，单丹就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以下一些思考和建议：首先，建立“廊区”概念，设置安全防护栏，建设安全走廊或项目安全区，实施特殊的安全管理和情报管理，确保中国有关项目的协调和安排；其次，防止恐怖势力渗透，强化反恐合作；第三，与少数民族部落建立沟通机制和人脉联系。第四，提供发展机会，争取人心，树立口碑；第五，加速当地民族语言人才培养，避免“用英语打天下”；第六，避免过度消费“巴铁关系”和中阿友谊。

第三位发言的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外交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富育红**，她的发言题目是《阿富汗和平之路：缺失的机遇与前进的动力》。

富育红首先介绍了伊斯兰党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她指出，希克马蒂亚尔来自阿富汗昆都士省北部的卡洛特地区，上世纪70年代受穆斯林兄弟会影响创立伊斯兰党。1979年，伊斯兰党分裂，希克马蒂亚尔领导了较大的派系，即伊斯兰党希克马蒂亚尔派或伊斯兰党古尔布丁派。在80年代的对苏作战中，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组织是最著名、最激进、纪律最严明的组织，也是获得最多军事和财政援助的组织。他曾短暂担任阿富汗总理，在90年代的内战时期因对喀布尔

市区发动火箭弹袭击而遭受国际谴责。9·11 事件后，希克马蒂亚尔宣布对西方部队发起“圣战”，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结成松散的同盟，因而被美国指定为恐怖分子。希克马蒂亚尔的主要活动范围是阿富汗中部地区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

富育红将伊斯兰党和阿富汗政府和解的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伊斯兰党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二是与塔利班的斗争。塔利班实力的扩大以及其它国家对塔利班的支持促使伊斯兰党的军事领导人改变长期策略，通过进入政治领域来保持其地位。三是阿富汗政府的推动。2014 年贾尼政府上台后，由于国内安全局势恶化，贾尼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和伊斯兰党领导人的和解，以期缓解压力，同时推动塔利班和其它反对组织加入和平进程。最后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在阿富汗政府的努力下，联合国取消了对希克马蒂亚尔的制裁，美军 2014 年的撤军计划和行动也鼓励了伊斯兰党加入和平谈判。

富育红认为，和解的积极意义在于向其他反对武装传达了积极的政治信号，而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民众反对给予伊斯兰党司法豁免，对前军阀势力保有深刻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希克马蒂亚尔的回归可能加深政府已有的分裂。

富育红最后指出，可信人物在谈判团队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谈判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谈判也是如此；在军事上打击反对力量的同时应当努力促使其转型加入政治主流，对于阿富汗而言，应当同其他武装团

体进行接触和对话，为此需要进一步了解塔利班的内部关系；在民众不支持、各集团敌对关系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即使政府与塔利班达成了某种协议，也不意味着阿富汗将真正实现和平，少数群体和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利益对持久和平同样重要；5. 应当注意到前军阀等地方政治强人在阿富汗国内的双重作用。

在本场讨论阶段，与会人员就阿富汗的媒体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认为包括塔利班在内的一些反对组织媒体宣传水平很高，值得重视。

第四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罗明，他的发言主题是《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的发展演变》。

罗明首先介绍了建立促进会的原因。他指出，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Jamayyat-E-Islami Afghanistan)由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于1978年建立，现任党主席是其子萨拉赫丁·拉巴尼(Salahuddin Rabbani)。促进会的主张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是伊斯兰主义的温和派，主张阿富汗为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国家。

促进会的前身是阿富汗伊斯兰复兴党。由于民族问题，阿富汗伊斯兰复兴党分裂为伊斯兰党、促进会等多个组织。1973年，达乌德通过政变上台，希望平衡阿富汗的外交，但已无法控制亲苏的人民民主党在政府中的影响力。1978年，达乌德试图抓捕人民民主党领导人，但未获成功。1978年4月，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总统。在这一背景下，促进会建立并发展成一个穆贾希丁组织。

随后，罗明解释了促进会作为穆贾希丁组织在政治舞台

上扮演的角色。罗明指出，促进会的建立及初期发展与阿富汗国内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其塔吉克化、变成以塔吉克族为主的政治力量的原因主要有：1. 希克马蒂亚尔与拉巴尼和马苏德（塔吉克族反苏军事指挥官）的矛盾以及阿富汗的民族构成问题；2. 1973 年达乌德政变前塔吉克族的政治参与问题；3. 拉巴尼-马苏德的政治与军事联合给阿富汗塔吉克族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会在穆贾希丁组织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促进会团结了塔吉克人，强化了塔吉克意识，改变了塔吉克人的政治地位，打破了普什图人统治阿富汗的传统。此外，促进会的政治目标多次调整，其领导层并不囿于宗教，会根据政治利益对目标作出适当的调整。

罗明在最后分析了促进会在政治舞台上的考验。他认为，促进会面临着党内矛盾、国内政治困境（包括塔利班的威胁以及与政府的矛盾）和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三重考验，其领导危机和内部矛盾是威胁促进会的重要因素，但促进会本身也在发展。他认为，促进会在阿富汗政治领域有很大影响力，未来可能将更多地代表塔吉克人，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在阿富汗政治领域占有较为稳定的地位。

第五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钱雪梅，她的发言主题是《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历史回顾：1979-2019 年》。钱雪梅首先指出，阿富汗和解的特点在于始终伴随着战争，和解是战争的产物。随后，她对阿富汗 40 年来的和平努力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对苏战争期间，国际性的谈判是日内瓦谈判，其主要推动者是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即今天的伊斯兰合作组织）。1980 年，联合国大会决定要求联

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特使进行斡旋，推动谈判。当时进行的谈判是间接谈判，联合国特使除了劝解工作外，主要充当谈判双方的“传声筒”。谈判自 1982 年开始，1985 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会面、冷战趋于缓和后，谈判双方才决定全面缓和。1985 年底，苏联开始加强对喀布尔的施压，要求喀布尔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在认为卡尔迈勒“不听话”后，苏联将其撤换，新上任的纳吉布拉在 1986 年执行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族和解政策。日内瓦谈判达成的协定包括四个部分：1. 苏联撤军；2. 巴阿互不侵犯；3. 美苏确保巴阿互不侵犯；4. 解决难民问题。她进一步指出，纳吉布拉在苏联授意下推动的民族和解有一个特点，即愿意与穆贾希丁组成联合政府，但要确保人民民主党的主导地位，但并没有成功，即存在权力分配的问题。苏联撤军和解体后终止了对阿富汗的支持，于是阿富汗爆发了内战。

钱雪梅认为，阿富汗人原本有原生的和解愿望，其没有实现的原因和细节有待研究，而谈判一波三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边打边谈”，即双方将和谈作为一个手段，没有将和平作为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在于美国主导了国际社会舆论。

最后，钱雪梅阐述了她对阿富汗问题的几点思考：

首先，和谈与战争始终形影相随。就阿富汗而言，和谈是战争的继续，参与者试图把战场上的优势转变为政治上的红利，或是想把战场上的劣势掩盖起来，通过政治谈判将损失降到最低。和谈是战争的一部分，但比纯粹的战争要好。

其次，从历史上看，阿富汗国家间的和解是成功的，但国内和解截至目前没有成功过。国内的和解总是依附于国家

间的和解，国家间的和解是国内和解的一个前提。

第三，要区分“和谈”、“和约”和“和平秩序”：和谈只是一种行动，可能成为战争的一部分或与战争并存；和约（或休战）一定是和谈的内在组成部分；和平秩序除需要政治和约以外，还需要确定基本权力分配、建立政府、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

第六位发言的是**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邵学成**，他的发言主题是《阿富汗考古美术的最新进展》。邵学成首先强调了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指出与中国文化历史相比，阿富汗的特点在于文字记载很少，但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玄奘法师就曾于公元 629 或 630 年间经过巴米扬。

随后，邵学成以巴米扬为例进行了深入介绍。他指出，巴米扬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为它起初受害于恐怖主义和战争，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体现了近 20 年来阿富汗考古学的所有发展，能够验证 1919 年阿富汗建国以来的诸多事件。《大唐西域记》和敦煌藏经洞的文献记载了巴米扬在公元 629 年至 720 年左右的、约 100 年间的变化。公元 580 年至 620 年间，世界最高的佛像位于阿富汗的巴米扬，其出现的原因是艺术史领域关注的问题。

邵学成强调，在对阿富汗古代文明的研究中，美国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该领域作用发挥最大的是法国，其次是日本。阿富汗目前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查姆回教寺院尖塔和考古遗址，另外一个巴米扬谷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址。在 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托管阿富汗所有文化遗产后，日本通过捐款获得了丰富的人脉关系。此外，法国和

阿富汗于 2016 年签订条约，约定在未来 10 至 20 年间由法国继续帮助阿富汗绘制考古地图，与其展开人文交流。

邵学成指出，在考古领域，中国考古学家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影响力远不及日本考古学家，中国的参与度也远不及日本、法国等国。中国的考古学家既缺乏条件，又缺乏相应的能力，在该地区该领域缺乏相关研究经验。在考古美术领域，除语言学外，中国出版的书籍只有张敏的《阿富汗文化和社会》和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Rene Grousset）著、常书鸿翻译的《从希腊到中国》，与法国和日本学者发表的大量报告研究相去甚远。邵学成介绍，在巴米扬大佛的修复工作中，日本给予了许多投资，体现出“文化先行，经济辅助”的特点，而德国更是将自己的首次海外派兵安排在阿富汗，其理由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他们有战后重建的经验，可以将经验带给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修复文物。

邵学成接着指出，巴米扬大佛被毁确实是一个悲剧，但与此同时给科技考古带来了大量机会，因为过去的文物保护禁止对其进行手术或分析化验，但由于巴米扬大佛被毁反而为最新的考古设备、分析设备等的投入提供了机会，进而让科技考古学者获得了中亚历史、乃至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样本。

本场会议末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钱雪梅进行了会议总结。她指出，阿富汗历史上历经磨难，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动乱，但战争不是阿富汗自己的选择，可以说是其地缘政治的命运。阿富汗是亚洲的心脏，受制于各种各样的

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可以用“政治生态”一词来概括。阿富汗的和平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努力，但大国态度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等都会给阿富汗的和平增加更多变数。